

文化折射与融合： 翻译规范视域下华兹生英译苏轼诗词研究

苏 欣

(中央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华兹生是国外迄今为止翻译苏轼诗词最多的一位译者。按照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 将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 能够更准确地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实际抉择。华兹生的译诗选篇倾向于山水禅诗和乐观主义诗篇, 反映了战后美国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译诗的预备规范。在操作规范方面, 苏轼诗歌中的节奏、叠词和对仗等形式特点被折射译入英语的自由诗体中, 产生了译文杂合的现象。在初始规范方面, 华兹生在源语文化规范和目的语文化规范之间寻求平衡, 使得苏轼诗词在异域文化中得到再生与融合, 其译作是中美文化折射与融合的结果, 对当下典籍英译具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 《宋代诗人苏东坡选集》; 汉诗英译; 华兹生; 翻译规范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2022)04-0074-06

苏轼是创作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性人物, 他的诗歌在国外受到了广泛关注。据彭发胜统计, 苏轼共有 291 篇作品被翻译成英文, 其作品共计被英译 650 次, 在历代诗人英译情况中排名第六, 在宋代诗人中排名第一^[1]。西方世界对于苏轼诗歌的译介始于 1853 年鲁米斯(A. W. Loomis)的翻译, 其后出现的一些代表性译者包括华兹生(Burton Watson)、王红公(Kenneth Rexroth)、孙康宜(Kang-I Sun Chang)、朱莉叶·兰道(Julie Landau)和梅维恒(Victor Henry Mair)等人。其中, 华兹生是目前为止翻译苏轼诗词最多且影响力最大的一位译者。

华兹生(Burton Watson, 1925—2017)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 自 19 世纪 50 年代起从事汉学研究与中国典籍翻译, 涉猎的领域包括古代文学、哲学、佛学和史学等。华兹生对于苏轼作品的译介成果主要体现为 1965 年和 1994 年出版的两部作品。1965 年,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兹生所译的《宋代诗人苏东坡选集》(*Su Tung-p'o: Selections from A Sung Dynasty Poet*), 该书选译了 86 首苏轼作品, 此后该书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集·中国系列丛书》。1994 年, 铜谷出版社(Copper Canyon Press)出版了该

书的修订版《苏东坡诗歌选集》(*Selected Poems of Su Tung-p'o*)。相较于 1965 年的版本, 1994 年版增选了 30 首作品, 共选译 116 首苏轼的作品。该书受到美国艺术捐赠协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读者文摘基金(Reader's Digest Fund)、华盛顿州立艺术委员会(The Washington State Arts Commission)等多家机构的赞助。次年, 该书获得翻译金笔奖(Pen/Book-of-the-Month Club Translation Prize),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为该书题词, 称“华兹生是本世纪译笔最好、最能持之以恒、最多产的中国文学翻译家”^[2]back cover。

华兹生的典籍英译成果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目前国内外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其对于《史记》和子书的翻译。对其译诗专集的研究多集中于《寒山诗集》《白居易诗选》等, 对《宋代诗人苏东坡选集》的关注仍较少, 且现有研究多停留在文本或语言层面, 忽略了社会历史因素对于其译介活动的影响。华兹生的译作能够在西方广为接受, 与其译诗的选本理念、译介策略等直接相关, 值得从社会文化层面对其进行分析。鉴于此, 本文以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基础, 对《宋代诗人苏东坡选集》进行描述性的研究, 重构译者所遵循的翻译规范。

收稿日期: 2022-01-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传统藏戏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研究”(21YJA740026);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翻译规范视域下华兹生的苏轼诗词英译研究”(SZKY2021098)

作者简介: 苏欣(1999—), 女, 山西运城人,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

“规范”一词原属于社会学范畴,图里通过对希伯来翻译文学的考察,提出了翻译规范的概念。图里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各个层面上的决策都受规范的制约,翻译规范是译者在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篇章传统规范之间取舍的产物^{[3]56}。他区分了三种翻译规范:“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预备规范”涉及“翻译政策”和“翻译的直接性”问题,前者指影响文本选择的各类因素,后者指作品是否为转译。“初始规范”是译者在进行实际翻译活动之前带有价值判断意义的一种取舍原则:要么以原文为归依,遵照源语规范;要么遵循目标语文化中活跃的译语规范^{[3]56-57}。“操作规范”控制着翻译活动中译者所做的实际决策,这一规范又可细分为“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和“篇章—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s norms)。母体规范决定译文的宏观结构,“篇章—语言规范”影响译文的微观结构,如句子结构、词汇的选择、斜体及大写的应用等^{[3]58-60}。总体上,就三者的关系而言,预备规范在时序上最先作用于翻译活动。预备规范和初始规范一起在整体层面上统摄翻译行为。初始规范形成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倾向,对译者微观层面的抉择产生影响^{[3]59}。但初始规范并非总是能够决定操作规范,事实上,各种规范之间呈现动态的关系,相互交叉作用,共同影响翻译活动。

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突破了语言学翻译理论的限制,将文本置于历史文化语境中,有力地解释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实际抉择。

二、预备规范和译本的选篇特色

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时,往往会考虑目标语文化的各种规范。那些顺应目的语文化时代背景、契合目标读者文化需求的选篇,往往能拥有更好的接受度。

华兹生翻译苏轼诗词是在二战后,战争的创伤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对战争感到厌恶,对垄断资本主义感到怀疑,种族矛盾、移民问题、贫富差距、意识形态的对立等问题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增。美国民众由此感到恐慌迷茫,社会上充斥着对现实的失落和不满情绪,传统价值观和信仰受到挑战。20世纪60

年代,政权的更迭促使各种民主思潮、左派团体、民权运动等层出不穷,信仰多元化成为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显著特征,这为东方禅宗思想在美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美国民众普遍希望从遥远的东方文明中寻求精神寄托,来自东方的禅道思想在美国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在旧金山文艺复兴时期,固然许多参与运动的诗人都读过《道德经》之英译本、学日本禅、读中国诗词及日本俳句之英译本,更值得注意的是‘搜索的一代’年轻人也一样喜好这些读物及作品,因此对东方思想之追求乃成为当时的一种时代风气。”^{[4]85}。人们普遍渴望和平与安宁,渴望回归自然,山水禅诗中静谧和谐、淡泊避世的意境,契合了美国读者所追求的内心理清和自由,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影响下,华兹生选材侧重于两类,一类是苏轼的山水禅诗,另一类是反映苏轼乐观主义精神的诗文,有意过滤掉了苏轼针砭时政的诗歌。

选集中,华兹生根据苏轼的生活轨迹将其作品分为五个时期:早期(Early Years: 1059—1073)、中期(Middle Years: 1074—1079)、第一次贬谪(First Exile: 1080—1083)、复官(Return: 1084—1093)、第二次贬谪(Second Exile: 1094—1101)。苏轼以诗托讽、针砭时政的诗歌作品主要集中于乌台诗案(1079年)之前。“乌台诗案对苏轼文学创作影响较大,此案之前的苏诗高扬现实主义,紧扣时代脉搏;此案之后的苏诗追求旷真,转向‘和陶’。”^[5]乌台诗案前苏轼创作了大量针砭时政、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包括《黄牛庙》(1059年)、《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1071年)、《赠孙莘老》(1072年)、《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1072年)、《和韵答黄庭坚二首》(1072年)、《山村五绝》(1073年)等。华兹生在其书中的第一部分(Part One Early Years)共收录了40首诗歌,其中反映民生疾苦的仅有苏轼1073年创作的《山村绝句》(Mountain Village),其余均为苏轼的山水诗以及苏轼游访寺院时的作品。

选集的后三部分(1080—1101)是苏轼被贬期间创作的诗歌,共42首,分别是被贬至黄州、惠州和儋州时所做。华兹生所选诗歌大多体现了苏轼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如《初秋寄子由》《东坡八首》《出颖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颖舟初别子由二首》《迁居临皋亭》《次韵江晦叔二首》等,却极少选择其贬谪期间所做的忧国忧民的诗歌,如《荔枝叹》《和陶劝农六首》《安期生》《次韵郑

介夫》等。另外在苏轼的众多散文和赋中,华兹生仅选择了《赤壁赋》(前后)两首,以及《答案太虚七首(其三)》,而这三篇无一不体现了苏轼善于超越苦难的人生哲学。华兹生在序言中谈到:

这些流放经历,不仅给他(苏轼)的政治野心带来了耻辱和挫折,而且给他的健康造成了威胁。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他感到痛苦难过,但他很少在诗中表达出来,他的诗歌很少流露出沮丧绝望的情绪;与弟子由的聚少离多,常让他感到难过。但是他似乎有着对生活不可遏制的乐观,他将自己融入到周围的自然环境和居民百姓中,从而缓解了他的悲伤情绪。善于超越痛苦,他是最令人鼓舞的中国伟大诗人之一。^{[6]9①}

对于当时饱受战争之苦的美国社会,此类诗文中所体现出来的苏轼对于不幸现实的坦然对待和自我排解的态度,对于弥补美国战后的精神失落,重建社会价值取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苦中作乐的特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深受美国民众的推崇。因此华兹生侧重于选择此类作品,着力传达这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力量。

结合战后美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发现华兹生的选篇契合了目的语文化需求,受到了战后美国社会预备规范的影响。当时美国社会渴望从东方的山水禅意文化中汲取养分,重建战后的社会价值体系,而华兹生的选篇遵循了这种预备规范对于文本选择的要求,这样的选篇倾向使得译本在目标语文化中获得了更好的接受。

三、操作规范与译诗形式

操作规范指影响译者实际翻译过程的规范,又细分为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和篇章—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s)。母体规范涉及译作的完整性,具体包括译文的省略、文本章节划分、译文增补或添加脚注;篇章—语言规范制约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微观语言层面的选择,涉及句子结构、词汇选择、使用斜体或者大小写、标点符号的使用等具体的选择。本文通过对华兹生译诗形式的分析,力图重构译者的操作规范。

在接受陶忘机的采访时,华兹生坦言自己的译诗策略受庞德和韦利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后者。他说:“尤其是诗歌翻译,我发现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多地阅读优秀的当代美国诗歌,因为当代美

语是我希望在诗歌翻译中所使用的语言。我从不试图将其翻译成任何古代英语诗歌的形式或风格。”^[7]

庞德、韦利等人的散体译诗观也影响了华兹生的汉诗翻译。在《哥伦比亚中国诗选:从早期到十三世纪》中,华兹生写道:

只有当译者抛开传统英诗的韵律和节奏以及西方诗歌的措辞和主题,创造一种更为自由的形式,让原作(中国古诗)的力量和表现力得以彰显时,中国古诗才能成功地译成英文。众所周知,这一创造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庞德、韦利等译者在本世纪前几十年里努力实现的。如今在这一领域工作的译者仍从中受益。^{[8]12-13}

受到当时社会这种诗学规范的影响,华兹生的译诗摒弃了传统的韵体诗形式,采用无韵自由体来进行翻译;语言上遵循当时美国诗坛的语言规范,措辞简单晓白,句式简洁,语序通顺。

虽然采用了无韵自由诗体,但同时华兹生也十分尊重中国古诗的异质性。为了体现汉语诗歌在诗行和节奏上的特点,华兹生采用逐行翻译的方式,译文诗行与原作诗行一一对应,且每行长度与原作大致相同。并且在每首诗的注释中,他都以“5-character”(五言)或“7-character”(七言)标注出每行的字数。他曾指出:“就汉语诗歌而言,由于其词序与英语极为相似,而且行文十分具体,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通常会被其引导,甚至受其限制。”^[9]但由于中英语言的差异,原诗的形式特点不可能完全不变地译入英文,对此,他选择将汉语诗歌的平仄停顿、叠词和对仗等结构融入到了译诗当中,从而形成了译文杂合的现象。这种译诗特色与当时的诗学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黑山派和垮掉派为代表的反学院派诗歌兴起,在这样的诗学背景下,第二代中国诗歌译者们主张吸收、借鉴中国古典诗的文学技法,如王红公、斯奈德和威廉斯等人,他们“不是表面上采取东方的事物、意象、典故,而是挪用中国古典诗的内在经验、结构与思维模式”^{[10]279}。华兹生受这样的译诗传统的影响,主张在译诗时尽量保留中国古诗在语序、修辞、节奏等方面的特征。因此,尽管华兹生采用无韵自由

①引文为本文作者所译,下同。

诗体进行翻译,但是他在译诗中采取以逗代步的方法再现原诗的节奏,同时保留了叠词的声韵节奏。以《浣溪沙(其四)》为例:

浣溪沙(其四)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
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
敲门试问野人家。

Along the Road to Stone Lake

**Flutter, flutter, on clothes and cap,
jujube flowers fall;**

**Village south, village north echo to
spinning reels.**

Half leaning on the old willow, they
peddle yellow melons.

**Wine-drowsy, a long road, I'm get-
ting sleepier;**

**Sun high, throat parched, thinking
only of tea ——**

I'll knock on a gate and see what the
villagers'll give me. ^{[6]60-61}

译文的首句中,华兹生将“簌簌”译为“flutter, flutter”,保留汉语的叠词,生动地体现了在微风吹拂下,枣花纷纷落下的声音。在译文中,逗号的使用十分频繁。英语诗歌的节奏由轻重音步来体现,一般不会轻易在诗行中频繁使用逗号。但华兹生采取了这样独特的处理方式,通过对照原词与译文,可以发现,华兹生依据汉语的平仄停顿,在每一个完整的语义单元后加逗号做停顿,再现了原文的节奏,同时逗号的使用,使得原句断成几个形容词短语和名词短语,更加突出了主要意象。例如“clothes and cap”“jujube flowers”“village”等,再现了原词中静谧的乡村之景。以其另一首《汲江煎茶》为例:

汲江煎茶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Dipping Water from the River
and Simmering Tea**

Living water needs living fire to boil;
Lean over Fishing Rock, dip the clear

deep current;

**Store the spring moon in a big
gourd, return it to the jar;**

**Divide the night stream with a lit-
tle dipper, drain it into the kettle.**

Frothy water, simmering, whirls bits of
tea;

Pour it and hear the sound of wind in
pines.

Hard to refuse three cups to a dried-
up belly;

**I sit and listen —— from the old
town, the striking of the hour.** ^{[6]131}

这首诗中,颌联对仗工整,“大瓢”与“小杓”,“贮月”与“分江”,“归春瓮”与“入夜瓶”一一对应,体现了汉诗的平衡美。译诗中,华兹生尽量保留原诗的对仗结构,将其译为英语的平行结构。“store the spring moon”与“divide the night stream”,“in a big gourd”与“with a little dipper”,“return it to the jar”与“drain it into the kettle”一一对应,让英语读者感受到汉诗结构上的平衡美。同时,华兹生按照汉语诗歌的平仄停顿和语义,在译诗中的对应位置“in a big gourd”和“with a little dipper”后加逗号以示停顿,再现了原诗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这种在诗行中使用逗号以示停顿的做法,在整首译诗中频繁出现,最后一句诗中还使用了破折号以示停顿。通过这种独特的译诗方法,华兹生在不保留尾韵的情况下,仍然巧妙地展示了汉语诗歌独特的韵律和节奏特点,从而形成了一种融合汉语格律诗与英语自由诗的独特译诗风格。

通过对比华兹生的译本与苏轼诗词原文,可以发现,华兹生在传达汉诗的意蕴与保持汉诗的结构之间保持平衡,译诗既符合当时美国社会的主流诗学形态,有效传达了原诗的含义,又尽力贴近中国古典诗词的结构特征,让英语读者感受到中国古诗的魅力。

四、初始规范与整体翻译倾向

汉诗英译涉及中英两种文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在两种文化之间做出选择,这就是译者所遵循的初始规范。译者要么以原文为归依,遵照源语规范,着眼于传达源语文本信息的充分性,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带给译文读者陌生化的异

国情调;要么遵循目标语文化中活跃的译语规范,着眼于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在翻译过程中牺牲原文的某些特点。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中,预备规范、操作规范和初始规范三者相辅相成,交叉作用,因此可以从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层面反推译本的初始规范。

在翻译选材方面,华兹生侧重选择的山水禅诗和乐观主义诗歌满足了战后美国读者的文化心理需求,对于弥补战后美国社会中的失落与不满、重建社会的价值取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吸引了大批美国读者,促进了苏轼诗文在美国的传播。华兹生翻译苏轼诗歌正值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垮掉的一代”的风暴,连同其他反学院派诗歌运动席卷美国诗坛,产生了第二次“中国热”。这次运动中,“禅和道的思想已经得到更加多样化的解释,而中国诗的语言方式、风格方式,成为美国诗人寻找自己声音的指路牌”^{[11]48}。在翻译苏轼诗词作品期间,华兹生曾得到美国《俄利根》(Origen)诗歌杂志编辑科曼(Gid Corman)和“垮掉派运动”主将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指点,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学传统对华兹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一诗学传统下,译者普遍借鉴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技法,从而革新美国的本土诗学。华兹生在此影响下,其初始规范也反映出源语文化导向性,表现为对苏轼诗歌中的平仄节奏、叠词和对仗等技巧的借用,从而使译文体现出中美两种文化的有机融合。因此,在初始规范方面,华兹生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尽量保持平衡,再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结构,同时选材上又关照当时美国读者的审美偏好,使用当代英语以及读者易于接受的无韵自由诗体,体现了“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折中。

本文以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基础,对华兹生的《宋代诗人苏东坡选集》进行了描述性的研究。研究表明,在预备规范方面,受战后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华兹生的选篇契合目的语读者的期待,体现出对于山水禅诗和乐观主义诗篇的偏好。在操作规范方面,在译诗语言和译诗形式上,受当时美国社会主流诗学形态的影响,华兹生在传达诗句意蕴与保持结构形式之间努力实现平衡,即选用现代英语自由体进行翻译,同时注重保留汉语诗歌的语言和结构特色,其译诗的诗行与原诗对应,用英语头韵、平行结

构,以及“以逗代步”等方式传达原诗的结构和韵律特点。总体来看,在初始规范方面,华兹生均衡地处理了中英两种文化规范之间的关系,选集既在主题和语言形式上兼顾了目的语文化规范,又彰显了汉语诗歌的结构特点。而这种处理,使其译介的苏轼诗歌展现了中国古典诗学与当代美国诗学的融合,从而很好地融入二战后美国诗歌写作的主流中,促进了苏轼诗歌在美国社会的传播。

《宋代诗人苏东坡选集》在出版当年便销售一空,出版商于1966年迅速重印,以满足市场需求,1977年又再版重印。美国权威文学读本推介网站“好读物(Goodreads)”的数据显示(截止2022年3月):《宋代诗人苏东坡选集》推荐指数高达4.2,体现了良好的读者反映。WorldCat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22年3月):共有450家美国图书馆藏有《宋代诗人苏东坡选集》。此外,该译本成为美国大学文学课堂的入门教材,引起美国专业评论人士和汉学界的关注,刘若愚、何瞻、毕晓普(John L. Bishop)、王志民(John Knoblock)、李智(Li Chi)等人也都对选集进行了推介。这些都显示出华兹生的译诗具有较强的流传性,促进了苏轼诗歌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

华兹生对苏轼诗词的成功译介为当前典籍英译提供了有益启示。首先,译介选篇十分重要。译者在选择译介篇目时,应考虑目的语文化的各种规范,根据时代需求和译语文化的主流诗学形态来确定选篇,那些契合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心理需求的选篇更容易被接受。其次,典籍译介中应该允许译介形式的多种创新,由此产生更加有效的翻译方法。如诗词译介中,译者应兼顾不同译诗形式的优势,适当进行变通和创新,从而使译作既满足目标读者的期待,又充分展现汉诗原作中蕴含的能量和表现力。总而言之,典籍英译从根本上是中英两种语言规范之间的碰撞和沟通,是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系统之间的交汇和融合,译者只有不断加深对两种文化的研究,才能使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被有效接受并获得持续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彭发胜. 中国古诗英译文献篇目信息统计与分析[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5).
- [2] Watson B. Selected Poems of Su Tung-p'o[M]. Port Townsend: Copper Canyon Press, 1994.
- [3]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4] 钟玲. 美国诗与中国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5] 周宝荣. 乌台诗案与苏轼“以诗托讽”[J]. 史学月刊, 2008(10).

[6] Watson B. *Su Tung-p'o: Selections from A Sung Dynasty Poet*[M].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7] Balcom J. An interview with Burton Watson[J]. Translation Review, 2005(1).

[8] Watson B. *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y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9] Watson B. *The Pleasures of Translating*[EB/OL]. (2001-00-00) [2021-11-30]. http://keenecenter.org/download_files/Watson_Burton_2001sen.pdf.

[10] 钟玲. 美国诗人史耐德与亚洲文化: 西方吸纳东方传统的范例[M]. 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03.

[11] 赵毅衡. 诗神远游[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Cultural Ref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n Burton Watson's Translation of Su Shi'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Norms

SU X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foreigners, Burton Watson has translated the most poems of Su Shi so far. According to Toury's translation norms theory, placing the text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an exactly explain the translator's actual choic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Watson's selected poems tend to be scenic, buddhist and optimistic ones of Su Shi, which reflects the preliminary norms of poetry transl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thoughts of post-war America. In terms of operational norms, the rhythm, reduplicative words and antithesis of Su Shi's poetry are refracted and translated into the English free verse genre, which produces a hybrid translation. In terms of initial norms, Watson seeks a balance between the cultural norm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so that the poems of Su Shi are regenerated and integrated in a foreign culture. His transl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ref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which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 *Su Tung-p'o: Selections from A Sung Dynasty Poe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Burton Watson; translation norm

(责任编辑 合 壹, 实习编辑 周沁仪)